

照亮前路的真理光芒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启示录之“求索篇”

“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今年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深刻指出。

回望百年沧桑,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真理旗帜、接续奋斗探索,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能的奇迹。向着新的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我们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跨越百年,感悟真理伟力

1921年1月1日,阳历新年,湖南长沙,大雪纷飞。

十几个年轻的知识分子,踏着五四先进文化催生的救国潮流,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民学会长沙学员会员大会,讨论如何“改造中国与世界”。

毛泽东在会上发言:“至于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

翻开历史的卷轴,自晚清以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制、议会制、总统制……无数志士仁人曾为救亡图存、革新图强而苦苦追寻、上下求索,但最终都失败了。

在各种思潮和主义的激荡甚至试错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走上历史的舞台。

“在四国白色政权的包围中间,产生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红色政权区域,在目前的世界上只有中国有这种事。”井冈山的星星之火,给迷雾中前行的中国革命,带来了崭新的希望。

“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在一个农民人口超过80%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如何进行革命的一系列问题,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党带领各族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基础上,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建

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从未停止过作答。

崭新的课题,艰辛的探索。从指明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回答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从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支持推动农村土地改革;从兴办经济特区,到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立足中国国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进行改革开放,由此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发展大潮波澜壮阔,神州大地日新月异。仲夏时节,浙江余村绿意正浓,一派江南好风光。

从昔日水泥厂、采石场遍布,漫天灰尘迷人眼,到如今被拆迁的水泥厂旧址变身五彩田园,余村多年来的绿色发展实践,生动诠释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

以“中国梦”凝聚最大公约数,以“五位一体”部署总体布局,以“四个全面”谋划战略布局,以“一带一路”扩展国际合作新空间,以构建新发展格局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取得历史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实事求是,永葆创新活力

延安革命纪念馆里,四块二尺见方的石板经历70多年的岁月风霜已显沧桑,然而石板上遒劲有力的大字——

“实事求是”,始终闪耀着真理的光芒。

这石刻来源于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门楣,那是毛泽东同志在1943年亲笔所题。

这四个字,蕴藏着百年大党始终保持理论活力和创造力的关键密码。

延安城东北的桥儿沟革命旧址,一座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天主教堂静静矗立。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里召开。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毛泽东同志在这次会上首次提出这一个关键命题。

一种对科学理论运用和创新的自觉自信,全新开篇。

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引领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推翻“三座大山”,第一次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前加上“中国特色”的定语,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中写下令人瞩目的“中国模式”,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创造了傲人的“中国奇迹”……

“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1978年,安徽小岗村一间破旧茅草屋内,18名农民出于“填饱肚子”的朴素想法,冒险在“生死契约”上按下红手印。

一纸“契约”的力量能有多大?小岗村村民犹记得,“大包干”第二年,小岗生产队粮食总产量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产量总和。

从“大包干”到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从“三来一补”到发展乡镇企业……我们党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尊重基层、尊

重群众的首创精神,适时将一个个“点”上的突破与改革经验总结、提炼、升华,再用以指导全国的实践。

1935年1月,在遵义红花岗区子尹路96号一间仅27平方米、用油灯照明的小屋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开始独立自主制定和实施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群龙得首自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朱德的一首诗作,道出了遵义会议后的崭新气象。

10年后,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中国共产党首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把毛泽东思想写入了党章。

当年的会场,两侧墙上悬挂着6处标语,每一处都写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并缀有一个象征胜利的字母“V”。

从遵义会议到党的七大,两次会议都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只有时刻保持自我革新的品格、勇于修正错误的勇气,才能迎来最终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经历了无数重要的关口,但在每一次的突破中,中国共产党都能调整自己的政策或策略,以此确保革命、改革和发展的可持续性。”黎巴嫩共产党总书记汉纳·加里卜表示。

思想指引,凝聚复兴动力

2017年10月24日,人民代表大会堂万人大礼堂,“通过!”出席党的十九大的2300多名代表和特邀代表庄严举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又一次指导思想上的与时俱进。

4个多月后,人民大会堂再一次见证庄严时刻。

2018年3月11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如潮的掌声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载入国家宪法。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新时代中国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催生着最为宏大而独特的理论和实践创新。

“八个明确”“十四个坚持”既融合统一,又相辅相成,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以全新的视野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科学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说。

历史的进程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从哪里开始。

2020年,新中国史上、世界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突然暴发,世界经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中国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2020年3月29日,浙江宁波,春寒料峭。

习近平总书记冒雨来到舟山港穿山港区码头,深入机器轰鸣的企业车间,就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进行调研。

从浙江考察返京不久,4月10日,北

京中南海,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以《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为题发表重要讲话,提出一个重要论断——“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为开局“十四五”、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战略指引。

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也同时跟进一步。

2020年11月,初冬的甘肃,寒意渐浓。

定西市临洮县龙门镇大寨子村党群服务中心内,依然洋溢着温暖。乡亲们围坐在这里,饶有兴致地听从北京来的“老师”讲解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群众感慨道:“这样的宣讲把大道理讲成大白话,未来5年、15年,我们国家怎么发展、老百姓生活会有什么变化,我们一听就明白了。”

今年6月,建党百年之际,又一个理论通俗读本《新征程面对面》在全国各地书店上架,对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怎么看新发展阶段、新征程如何开启等14个重大问题,作出了深入浅出、透彻的解读。“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新的长征路上,面对更加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面对更加艰巨的改革稳定任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始终是全党坚定初心使命的力量源泉,始终是指引我们攻坚克难、奋勇前进的科学武器。

思想的力量穿越时空,真理的光芒照亮前路。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广大干部群众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定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调整完善财经政策 促进边区经济恢复和发展

——革命战争期间晋绥边区的经济工作

□ 张建梅 郭艳芳

以吕梁为腹地的晋绥边区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敌后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之一。是阻止日军西进,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要屏障。1940年1月,正式成立了全区统一的抗日民主新政权——晋西北行政公署。在抗日民主政权的领导下,边区进行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项建设,其中,边区经济建设是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有效地动员了全区的物力和财力支援革命战争,同时对发展边区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调节各阶级的收入,削弱乃至最终消灭农村的封建制度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晋绥边区人民在异常艰苦条件下,为支援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提供了财政经济巨大支持。

实行减租减息 调整农村生产关系 促进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

晋绥边区民主政权对农村生产关系进行了调整,主要体现在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和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公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没收地主土地改变为减租减息,这一政策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1938年秋和1939年夏秋,中国共产党就通过“牺盟会”“农救会”等组织发动群众在晋绥边区的石楼、灵西(现交口县)、方山县(现属吕梁市)开始了减租减息运动。

晋西北行署于1940年4月20日颁布了《山西省第二游击区减租减息暂行条例》,规定:对于地主的土地收入,不管是租佃还是年种(伙种地、伴种地),都照原租减收25%,并且取消其他的附加;欠债和旧债年利一律都不能超过10%;严禁扣租、现扣利;严禁剥削皮利、印子钱、高利贷。在执行过程中,二地委反映,此规定有的条文不切合实际,原因是,当时晋西北的山地实际产量下降30%左右,许多农民都按收成的情况酌量交租,每石交7斗左右,如果按条例执行则租7.5斗,农民不愿交。因此,晋西北行署对规定作了修改,于1941年4月1日重新公布修正后的《山西省第二游击区减租减息暂行条例》,规定:减租额为25%;且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的37.5%;钱息、粮息无论年利、月利均不得超过15%,并禁止现扣利,利滚利等高利贷及赌博债。

在总结减租减息工作的基础上,1942年9月20日,晋西北行署颁布《晋西北减租交租条例》,规定:山地以战前原租额,先以七五折算,再减去25%;伙种地出租人投资部分不减租,先以总产量除去投资部分,然后按照战前原分配中在出租人分得内减25%;对少数寡寡孤因缺少劳动力出租少量土地以维持生活者,地主中有抗日烈士或家庭成员因抗战牺牲,致使生活困难者,其租佃关系应予以区别对待,予以少减或不减。这一条例的出台保障了地主和农民的利益,稳定了租佃关系,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热情。同年11月6日,晋西北临时参议会修正通过了《晋西北减租交租条例》和《晋西北减息条例》,于是减租减息运动普遍展开。据晋西北1941年统计,17个县有20987户佃

户共减租17716石,平均每户减租8斗多,其中12个县减息8842元。

通过减租减息运动,发动与壮大群众力量,巩固扩大农村统一战线;调整农村生产关系,提高各阶层生产积极性,改善群众生活,推动了晋绥边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支援中央和西北财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加强公粮税款的征收管理 促进边区财力恢复和发展

在边区经济落后,民众负担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要保证战争供给,又要顾及群众利益,并且要把来之不易的公粮、税款收入保管好、使用好,就成为财政工作的艰巨任务。

及时调整负担政策,合理组织税收。公粮和税收是边区财政的两大主要收入,而征收政策是否恰当,直接影响着广大农民和工商业者生产经营的积极性。解放战争开始后,边区连年遭灾,但战争供应的负担逐渐增大,在这样的情况下,边区政府在保持农民最低的度荒口粮和种籽,又保证军队所必需的粮食的基础上,对公粮征收政策做了新的规定,将原来的按通产产量计算改为按实际产量或实际收入计算,依照规定的累进比例自下而上,直接征收。这样就照顾了不同地区、不同家庭之间灾情轻重程度的不同。可是,由于边区军队和脱产人员的迅速增加,加之在执行新条例中出现的“左”的错误,广大群众的负担仍然很重,1947年公粮负担后的余粮按人口平均为103.5斤,比1946年人均口粮166斤减少了62.5斤。进入1948年后,经过土地改革的解放区,取消了1947年公粮征收的过渡办法,建立了新的公粮征收制。新条例扩大了课税对象,规定不论自种、雇工耕种及出租、出伙,均须按照规定纳公粮;负担标准按土地通常产量计算,按户直接比例征收;确定通常产量,充分发扬民主。同时,在税率上废除过去的累进税率和免征额,实行比例税率。加之对“左”倾错误的努力纠正,以及1948年比较风调雨顺,当年的农业收成比较好,新条例实施后,群众的负担比例有了显著下降,由上年的2.8%降为11.72%,公粮征收后人均余粮达196斤,比上年增加近1倍,比余粮较好的1946年增加30%。同时,边区政府还在不断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营业税、货物税以及斗佃畜税、制产税、布匹营业税、

盐税等几种主要税收,制定了新的政策。如经过纠正“左”倾错误后于1948年颁布的《晋绥边区修正营业税暂行条例》及《施行细则》,取消了过去按总收入计算的累进比例征收制,代之以按资本多寡累进分定固定任务、平均分配的民主的征收办法;负担原则上,工矿业轻于商业,并奖励土产品、手工业作坊之发展;允许工商业者自由转业,商转工者同样享受减征奖励;地主、富农经营的工商业同样实行保护,同样按条例计征。新政策的实施使土地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促进了生产发展,保障了供给,同时加快边区工商业的发展,增加财政税收,为边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坚持内和外狠方针,加强缉私工作。走私的猖獗严重影响边区经济的发展,缉私工作的好坏,不仅仅关系边区的财政收入,而且直接影响边区整个经济建设。所以经过对前段工作的总结,1947年8月,边区政府对缉私工作作出了新的规定,明确缉私工作必须坚定贯彻“对内和、对外狠”的方针,凡条例规定禁止入口的货物,不论公私,都应依法没收,同时要求各部队、机关、团体积极协助缉查工作,但不得私自没收。对没收之违禁品的处置都作出了详细的规定。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紧了边区经济封锁,为不给敌货入境可乘之机,保护内地土产。1948年4月,边区政府又发出加强缉私工作的重要指示,要求各分区成立缉私委员会,加强了组织和领导,建立了缉私队,鼓励群众举报、举报等。这些措施,对打击走私、偷漏税都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据统计,缉私罚没收入占当年税收的比重,1946年为3.7%,1947年为7.8%,1948年为21.8%,3年罚没收入占总税收的18.4%。

强化审计监督,落实统收统支。为了消除贪污浪费等问题,更好地统收统支,集中财力支援战争,边区还对征收制度、预决算制度、会计制度、审计制度进行了修正完善。并且,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进一步扩大审计职权范围,健全审计制度,以充分发挥审计机构的职能,陕甘宁晋绥边区政府、联防军司令部、西北中央局于1948年4月以联合命令颁发了《陕甘宁晋绥边区暂行审计条例》,条例对审计机构设置和边区、分区、各县各级审计机构的职权、西北财经委员会的职权作了具体规定。这一条例的贯彻实施,把边区各级党政

军民各系统所属单位的各种财务收支完全置于审计职权监督之下。这样对于更好地贯彻统收统支,作到“取之合理,用之得当”,消除一切无纪律、无政府状态,集中财力,支援战争,都有着重要意义。

加强商贸管理 成立兴业公司 促进边区商业经济恢复和发展

抗战以前,晋西北的商业大部分垄断在少数地主、资本家手里,他们互相勾结,利用商品流通渠道百般压榨人民的血汗。“七七”事变后大同、忻州、太原、临汾先后沦入敌手,各地交通运输十分困难,货物购进时断时续,商贸行业十分萧条。1940年日军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货栈、门店遭受焚烧破坏,所剩无几。

1943年晋绥贸易总局为了统一领导,加强对商贸的管理,繁荣边区商业贸易,把晋绥行署机关开办的所有商店统一合并为兴业公司,任命廖诗权为总经理,张明才为副总经理,李余香为协理,下设营业、土地、财会、采购四个科,管辖3个货栈10余个分店、门市部,主要分布兴县、神府县一带,多数业务人员从本地雇用,少数领导骨干由晋绥行署配备。当时,采取正副总经理和协理集体领导,内地市场与机关留守人员以各科室为中心,分店、门市部和货栈互相协作,交流业务,雇佣人员和调整价格时,上报公司批准,公司人员禁止开设私营商店。公司任何领导及工作人员不能私自保存资财和货物,不能在贸易中接受商人礼品,更不能以公司名义赠送商人礼品。

兴业公司属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商贸,在自我发展的基础上还承担盘活边区商业贸易的重要任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消灭银洋黑市,严厉打击伪币,控制法币流通,提高本币信誉。抗战开始,根据地尚未发行农钞,敌伪趁机利用商人将伪币投入边沿地区,抢购物资。同时以大量奢侈伪品向群众倾销,掠夺法币

换取外汇。一些地主、资本家也暗地使用银洋,易地贩卖,致使物价飞涨,市场混乱。边区行署根据党中央指示积极发行“西农币”,并明确规定“‘西农币’是根据地唯一合法的单一本位货币。”兴业公司带头执行法令,坚持拒用伪币、法币买卖物资,并配合稽查队在兴县黑峪口、神府县采林和岚县界河口等地缉拿违法奸商,没收资财。对群众热情宣传“西农币”的作用,彻底揭露敌人的阴谋。严格控制外商携带本币进入根据地,购买物资按银行挂牌价格兑西农币;境内公私商贩存有伪币,必须兑换成西农币进行贸易。这样,消除了伪币在内地的流通,提高了本币的作用。同时,在销售商品上压低价格。土布由原来每匹2800元降为2000元,小米由原来的551元一斗降为360元,满足供应群众,群众蜂拥而来,有几个货栈和门市部虽然在短时期内出现亏本,但使“西农币”占领了市场,稳定了金融。

大力发展内地商业,积极组织对外贸易。日军连续“扫荡”,物资运输时有中断,造成内地土特产品滞销,日用必需品短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总经理廖诗权带领5个人,深入各县发动团体和个人开办商店,抽出420万元资助底垫,先后陆续办起了121个门市部。又动员采购科全体采购人员出动,四处组织内外商人,在抗日政权和部队的保护下,开辟了大同、交城运输线。主动联系12个硝磺生产火硝,价格由每斤130元提高到170元。组织了60头牲畜驮运,换回了大量军需和民用商品。每年春季群众都要添置生产用具,但经济很不富裕。各个货栈和门市部就同当地群众进行土货兑换商品。1945年3月收购群众铜钱1万斤、白锡3千斤、羊毛6千斤、牛皮3千张、生铁3500斤、火香4万捆、红枣1万斤、萝筐3.2万只,按市价折合,兑换给群众布袜2千、钢锅35万条、织布机300个、轧花机23架、轧花滚子15个、弹花机1架、缝纫机6台、铁锤350个、织袜架3架、铁锹300张、锄头200把、木杈41把。由于一些特殊贫穷的群众拿出更多的土货兑换工具,严重影响生产,公司一次就承担了89万元的亏损。

扶植群众合作社,帮助贫穷商人致富。由于常年战争的威胁,群众一般不敢轻易组织合作社生产,这在当时影响着商业贸易事业发展。兴业公司为了配合各县抗日民主政府扶植发展群众合作社,从各货栈、门市部抽调了80万元资金和10余种生产资料赊给群众办合作社,两个月就有31处开业生产,产品优先销售,优惠价格。瓦塘支店1944年7月至1945年3月为群众合作社推销棉花共5892斤、白麻282斤、烟叶177斤、羊毛81斤、羊皮72张粮食17石,收工入1416万元。对于缺乏资金的贫穷商人,货栈赊货支援商店。这样,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边区商贸事业的发展。

晋绥边区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调动了各阶层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加强了经济建设,克服自身财政困难的同时,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保证了战争的供给,为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作者单位:中共吕梁市委史志研究室)